

第七章

當前大學通識教育的非制度性危機及其 因應對策

一、引言

最近二十年來，台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在關心大學通識教育人士的努力之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很多大學院校負責人都強調通識教育很重要。特別是教育部兩梯次基礎教育計畫的研究工作推動以後，確實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本書第四、五、六等三章，討論大學通識教育從普及到深化得的發展方向及其細部計畫。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刻裡，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很多，例如：國內大學通識教育根本問題在哪裡？除了表面的熱鬧榮華之外，是否有什麼危機？我們應該如何因應？本章接著分析這些問題。

過去這幾年來，大學通識教育表面上很熱鬧，但是通識教育實際上仍面對一些危機，我們大概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第一是制度性的危機，第二是非制度性的危機。制度性的問題比較容易被發現，舉例言之，台灣的各種學術獎賞制度，造成大學通識課程師資難求，例如國科會傑出獎、教育部學術獎、教育部國家講座、傑出人才講座等，都是以專精某一個特定小領域的研究成就為考量。很少老師因為教學很認真，特別是開授

大一、大二共通課程而得到學校高度的肯定。已經退休的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因為教學成績優越，得到芝加哥大學傑出教學獎，但他從不寫專業研究論文，他只寫通識性的教科書，有好幾本得到國家著作獎，他因為教學成就而成為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我們台灣學術獎賞制度並不夠周延。清華大學前任校長沈君山當年感嘆，大學通識教育就行政方面而言沒有人願意管；老師方面沒有人願意教；學生方面沒有人願意認真上課。這些問題至今仍在，這是第一個制度面問題。

第二個制度性問題，是隨著校園民主的風起雲湧，這十多年來的國內大學院校課程審議制度難以落實的問題。國內大學院校將近一百六十所，但只有極少數學校的通識課程實施三級三審制，各級審議委員會審議開課計劃書，必須檢附開課教師近三年內與這個課程相關之各種論著，學經歷、著作目錄等資料。這套課程審議機制，可以使過去多年來一些被傳為笑柄的通識課程自然排除。課程審議制度的落實是制度性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制度性問題是我國特殊非常僵硬的會計制度與經費運用不夠彈性的問題。本章討論的重點不在於制度面的問題。相反地，本章將就非制度面的問題進行剖析。

二、危機(一):「反知識主義」心態

當前大學通識教育的第一個非制度性問題就是大學理念的日趨模糊，許多學校的行政負責人、教師與學生，對待通識教育的心態問題尚待調整。這種心態問題雖是非制度性的，但其影響力卻不容小覷，而構成通識教育發展的危機。這種危機我將它歸納為兩類，第一類可以稱為「反知識主義的心態」，我們知道「反知識主義的心態」原是一個思想史的專有名詞，它包括兩個含義：第一種是反對有知識的人（例如大學教授），美國文化傳統中就存有這種反知識主義的思想傾向。第二種類型的反知識主義，就是反對知識其本身，譬如說從莊子（約 399-295B.C.之間）就對知識抱持懷疑的態度，二十世紀毛澤東引導的革命運動，對於知識抱持懷疑或否定的態度，才會有文化大革命時工農兵群眾進駐大學的發展。這種「反知識主義」似乎隨著我們這些年來的教育改革，特別是大學通識教育的改革，而有捲土重來的趨勢。這種趨勢的台灣版本，基本上是反知識而不是反知識人。在一些大學裡，通識課程日趨逸樂取向，這種趨勢在研究型大學固然如此，在技職院校體系大學院校尤其嚴重。

我們如果上各大學網站，把各大學開授所謂通識課程全部下載，就會發現有很多所謂通識課程，其知識的承載度相當低，甚至有的課程隱含一種反對知識的態度。通識課程日趨逸樂取向，這是一個普遍的病態，這種病態植根於最近十餘年來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師資不夠，因此有很多年輕的大學院校教師，

對於大學教育還缺乏初步瞭解就已經為人師表，也因此，他們所規畫出來的課程就難免問題叢生。我覺得這個問題若未獲改善，教育部即使再投資千萬元，恐怕也都是付諸流水。這種逸樂取向的問題很多，我們不必一一列舉。譬如某老師開一門課，是要帶領學生來體認人與自然的關係，他就帶著學生到操場躺下來，聞聞泥土的芳香，這是授予三個學分的課程。另外，也有人引進把美國中小學的課外教學活動如「通識護照」之類，作為授予學分的課程在大學開課。這種未經深思的課程，基本上不是學生的問題，而是老師首先應該自我批判的問題。

上述第一個危機會導致相當嚴重的結果。第一，大學做為一個知識社群與非知識社群的界線，會愈來愈趨模糊。在這樣一個很不利的知識環境中，這種逸樂取向的課程對於大學的自我摧毀具有加速的效果。第二，我們知道「通識教育」這四個字，在國內大學院校一些師生的偏見中，是一個被污名化的名詞。一些人一講到「通識教育」就想到舊時代的「部定共同必修科目」，就想到學校裡諸多低水準的課程。研究有成的老師通常不願意對於大學一二年級學生，賦予一絲絲的關懷。「通識教育」已經長期被污名化，上述這一種反知識主義心態下所規畫的所謂通識課程，正好加深了學校同仁及一般未經深思的大學學生對通識教育的誤解。以上是當前第一個通識教育的弊病。

三、危機(二):「功利主義」心態

第二個危機是功利主義心態問題。「功利主義」在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政治哲學理念中,是指創造最大多數人最多數的福祉而言,但我在這裡所說的「功利」一詞,取其寬廣的定義,指許多的老師,特別是大學院校裡面負責行政職務的人,把通識教育做為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換言之,通識教育基本上是一個過渡性的、手段性的工具,通識教育本身不是目的。這種心態非常的普遍,它常表現為以下兩種形式:第一,國內許多大學基本都不是全科大學,也就是說它不是各個學門或領域都具備的大學,常常是以理工學院、醫學院或商學院為主。台灣絕大部分的大學都是學門不均衡的大學,也因此,基本上都具有專業掛帥的傾向。即使學門完備的研究型大學,也是普遍重專業而輕通識教育。許多的大學領導人,包括教務長,常把通識當作專業教育的肥料。一些醫學院校的負責人認為這些學校的通識教育應開台灣醫療史,再加開一些刑法、民法等課程,因為醫學生畢業之後,常常會有醫療糾紛,通識教育可以幫我們開這一類的課程。這種心態認為通識教育存在的理由是為了專業教育。在這個基礎上,通識教育是一個手段,它不是一個目的。

第二,種功利主義的表現是最近十年來出現的一種特殊狀況,就是通識教育被引導到為一個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存在。舉例言之,為什麼要學歷史呢?歷史教育就是要拓展學生生命中

的深度，這個學生能夠把現象放在時間之流裡面來思考，從而擴展學生的心胸，增加他生命的厚度，使他不再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一度空間的人。如果學校規定學生只要必修台灣史，完全不教中國史或世界史，這就是對歷史教育錯誤的認知，這種錯誤的認知所導致的結果，比把歷史教育當成人名地名加上條約的歷史教育還要嚴重。

這兩種不同形態對待大學通識教育的心態，造成兩種不好的結果：第一種是造成教育的「隧道效應」。譬如說有些商業技術學院只教台灣商業史；工學院只教台灣工程發展史。這種開課政策引導學生好像開汽車走進隧道裡面，只看到隧道內的狀況，隧道外面美好的風光則完全茫然無知。第二種現象則更為嚴重，那就是把學生訓練成政治的工具，這種作法和舊時代以「國父思想」作為部定共同必修課，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都導致教育的自我異化。「異化」是指一個人、一個機構、一個大學、或者是一個單位通過自身的活動（譬如說學校的教學活動），而導致它自身之所以存在的目的相對立的結果。教育部在2001年委託通識教育學會辦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訪視，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提倡「全人教育」，但是有些學校的通識教育的實施，卻直接或間接地造成教育自我異化的效果，再加上專業掛帥推波助瀾，使這個狀況更為嚴重。

四、因應對策：回歸教育基本面

以上簡單探討當前通識教育的兩個危機，這兩個危機有待關心通識教育的朋友集思廣益，共同思考回應對策。因應的對策可以多元多樣，但根本原則是：我們要回歸教育的基本面。通識教育有別於各種專業教育，它是最重要、最根本、最深刻的一種教育。我們應首先深思：什麼是通識教育？如果通識教育的目的在於啓迪學生的心靈，開拓學生的器識，那麼，中西文化教育可能是值得我們特別深思的一個方向。中西經典課程如果能推動配套措施，包括碩博士生擔任教學助教，就會做得更好。經典課程的設計，確實需要特別用心，例如我們可以用一些特定的主題如真、善、美、正義等等作為選擇經典文本的主題；或是以古今中外偉大而深刻的思想家及其作品，譬如柏拉圖、《論語》等均可開課；或選擇特定的議題，譬如說武器管制、SARS 等，也可以開授跨領域通識課程。我們也可以研讀與討論並重，老師跟學生就上課所觸及的深刻問題來互相討論，就會有更好的效果。

五、結論

二十一世紀剛剛開始，我們大家都特別關心大學教育的轉型，我們好像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往後回顧，我們看到二十年來，經過大家的努力，通識教育已經蔚為風潮。我建議，我

們也可以回顧，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美國的高等教育也處於類似的十字路口。哈欽斯（Rober Maynard Hutsins，1899-1977）以三十之齡，接任芝加哥大學校長（1927-1945），其後出任芝大的 Chancellor（1945-1951），在相對短的時間之內，哈欽斯將芝加哥大學提昇成爲一個世界級大學。哈欽斯的教育哲學就是經典教育爲主。另一種教育理念就是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所主張「生活即教育」，1919年杜威應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之邀，擔任一學期的客座教授，他的演講稿後來集成一本書，題爲《哲學的改造》。杜威提出所謂「實驗室的生活態度」等等。到底我們要走哪種路？值得我們思考。

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的華人社會的高等教育都努力於邁向新的境界，我們可以將通識教育作爲一個文化創新運動，閱讀偉大而深刻心靈所留下來的記錄，也就是古今中外偉大的經典著作，這是通識教育的一條坦途；甚至是自然科學課程，如果老師在教學之餘，讓學生重讀中文翻譯的愛因斯坦相對論，並一起討論，對老師及學生都是終身受用不盡。讓我們以正確的通識教育理念，解除當前的危機，邁向鳥語花香、落英繽紛的新未來。（2003年8月14日）